

秦汉史论丛

第七辑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张荣芳 (1)
- 广州地区秦汉考古的发现与收获 麦英豪 (7)
- 论汉晋时期的岭南开发 龙显昭 (23)
- 秦汉对粤战争与岭南开发 黄留珠 (39)
- 秦汉时期“中土”与“南边”的关系及南越文化的
个性 王子今 (54)
- 秦汉岭南建筑简论 陈泽泓 (67)
- 秦汉时期谪戍、徙迁的实施及其对岭南开发的影响
..... 李庆新 (83)
- 南越国新论 彭 年 (96)
- 从长安看南越 彭 曦 (100)
- 赵佗的功业、为人和心态 丁毅华 (105)
- 谈谈五色药石与南越王赵昧之死因 黄森章 (119)
- 汉晋岭南道教“丹砂灵药”考 王承文 (132)
- 秦汉时的香港 区家发 (148)
- 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林甘泉 (154)
- 汉朝边防军养兵费用之考察
——以西、北边境为研究中心 黄今言 陈晓鸣 (180)
- 西汉仓制考 邵 鸿 (194)
- 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 杜绍顺 (208)

关于汉代陂塘稻田模型的再考察····· [日本] 渡部武	(221)
汉代的文吏与儒生 ······ 卜宪群	(231)
汉武帝独尊儒术与齐学 ······ 安作璋 刘德增	(247)
秦始皇为何不焚“卜筮”之书 ······ 谭前学	(261)
关于汉代官印随葬制度的探讨 ······ 萧亢达	(272)
汉代礼治的建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泰国] 郭伟川	(284)
论两汉《诗》学 ······ 孙 筱	(298)
陆贾体用之诠释学色彩 ······ 李玉梅	(313)
缙衣零简 ······ 饶宗颐	(328)
“尹湾汉墓简牍”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 谢桂华	(332)
汉代统计中的指标与数列	
——从尹湾、居延、敦煌出土简牍谈起 ····· 李均明	(352)
夏侯谭生年、籍里及其相关研究 ······ 罗仕杰	(367)
马王堆三号汉墓纪年木牍性质的再认识 ······ 陈松长	(379)
略述秦汉时期大月氏人的迁徙 ······ 袁祖亮	(387)
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张传玺	(401)
香港汉代考古新发展 ······ 邹兴华	(410)
日本最近的秦汉史研究	
——以考古·文物为中心····· [日本] 杉本宪司	(426)
附录一 庆祝广州建城 2210 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曾宪礼 唐文浩	(432)
附录二 庆祝广州建城 2210 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目录·····	(441)
后 记·····	(447)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张 荣 芳

岭南地区属于边疆地区，封建时代的文人墨客，多以“南蛮之地”称之。有关这个地区的秦汉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十分贫乏，光凭文献材料，不足以认识这个地区的历史。解放以来，两广地区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发掘工作，不但发掘了一些重要的遗址，而且发掘和清理了数以万计的墓葬。如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两广的汉代墓群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把这些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进行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划出秦汉时代岭南地区的历史发展面貌。秦汉时期的岭南，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方面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聚居于岭南的南越族各部落、支族互不统属，“各有君长”，处于散乱无序的原始社会末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即派 50 万大军，分兵五路进攻岭南，于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统一岭南，实行郡县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郡下设若干县，将岭南纳入秦王朝封建大帝国的版图，使岭南各族结束了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酋长制阶段，踏进了封建社会阶段。秦末汉初，赵佗建立南越国，在国内实行郡县

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制度。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灭南越国，依中原建制，将岭南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所辖范围包括现在的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及越南北部。汉武帝时，中央统辖郡国数达百余，为了加强统治，建立监察郡国的制度，把全国分为 13 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其中交州刺史部所监察的范围，就是上述的郡县。东汉时州部长官权力渐重，监察区逐步变成了行政区。所以，原来地方的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岭南地区九郡的开设使岭南郡县制终于稳定下来。这个行政制度在岭南实行二千多年，功始于秦而成于汉。这个政治制度使岭南的封建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为岭南经济发展，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政治保证。

其次，大量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他们带来了铁制农具、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为岭南地区的开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考古资料表明，铁器已在岭南的农业、手工业等重要生产部门较为普遍地使用，牛耕在汉武帝以后也逐渐推广。这标志着岭南地区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跨进了铁器时代。例如农业，农作物种类繁多、园圃业发达。耕地面积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所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有余粮储备。生产的水果蔬菜，还源源北上。手工业生产，比起先秦时期有突破性的发展。青铜铸造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有铸造和锻造两种，而以铸造为主，并且懂得了先进的“失蜡铸造法”。关于冶铁业，由于《史记》、《汉书》记载，吕后时期不向岭南输出“金田铁器”，使赵佗大为恼火，因此或以为汉代岭南没有冶铁业。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几批具有岭南特色的越式铁器，说明岭南已有冶铁业。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继承和发展了新石器时代几何印纹陶的旧制陶工艺，出现了该地区古代陶瓷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纺织业也有长

足的发展，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套铜制印花凸板，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纺织史上最早的一套彩色套印工具。岭南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丝织物的原料、色泽、图案和工艺技术等，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原地区同期织物十分相似，说明基本上赶上了中原地区的水平。岭南的漆器制造业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从出土的漆器铭文来看，南越国都番禺和桂林郡冶布山两地都设有市府作坊制造漆器，成为岭南漆器制造中心。近年在广东广西的两汉墓葬出土大量玻璃，尤其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22 块平板玻璃，为我国汉代墓葬中首次发现，是目前为止时代最早的平板玻璃，弥足珍贵。经专家们鉴定，这些玻璃一部分是岭南地区自己制造的。玉石制造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南越王墓出土玉器 244 件（套），随葬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和保存之好，是全国汉墓所仅见。这些精致美丽、造型和设计风格与中原地区无多大区别的玉器，大部分是南越国宫廷作坊所制。岭南地区濒临南海，海岸线长，造船业发达。广州发现秦代造船工场遗址，这个造船工场主要生产平底船，吃水较浅，适应内河和沿海岸航行，建造的船只可载重 30—60 吨。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可以制造多种功能的“楼船”。总之，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秦汉四百年的开发，岭南地区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并逐渐接近或赶上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为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上述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同时，一些地区至东汉时仍“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

第三，秦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岭南地区传播、灌输、发展的时期，岭南的道德伦理深深打上了儒家的烙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成为正宗的封建意识形态。封建统治者通过建立学校，用儒家思想去教化人民，以期达到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目的。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积极兴办公私学校。办学者多

为从北方南下的士人，甚至是著名的经学家。例如汉末北海郡人刘熙，建安中期，“荐辟不就，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再如汉末、三国时期的虞翻，因触犯孙权，被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岭南籍的士人亦积极办学，如南海郡人黄豪，“通论语、毛诗，弱冠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学校教育以儒家学说为主，因此涌现出许多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孝子、忠烈之士以及政治、军事、学术等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出现了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代经学家和士燮、士壹、士薊、士武兄弟四人都从政的学者，说明儒家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儒家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和灌输，有效地改变了岭南“风俗脆薄”，“不识礼义，不闲典训”的落后状况，不但提高了岭南人的文化素质，而且加强了岭南人的凝聚力和对中原的向心力。

第四，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代。岭南依山面海的地理环境，成为大陆与海外进行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先秦时期在海滨和岛屿生活的越人，就开发了海上的航路，秦汉时代将这条航路向远洋发展，因以贸易中国的丝绸而著称，故称为南海“丝绸之路”。当时的番禺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书》说“番禺其一都会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南海“丝绸之路”开始于广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南越相吕嘉叛乱之后，即派遣黄门使者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从广州出发，到雷州半岛，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印度洋的印度半岛南部黄支国，换取上述国家的物产，如玻璃器具、象牙、犀角、银器、琥珀、玛瑙、玳瑁、果布等珍品，然后，从斯里兰卡途经新加坡返航。这是我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到上述这些国家的最早记录。这条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之后，一千多年来长盛不衰。它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

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和中国文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这条路线的互相交流而大放异彩，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五，大量中原人移居岭南，“与越杂处”，促进了各族人民大融合，使岭南逐渐变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秦朝时，南迁的中原人共有三批：第一批是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岭南，胜利后在岭南设三郡，这些人都留居岭南。第二批是“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批是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女子同留守岭南的秦军官员结合成个体小家族。秦始皇的“徙民实边”政策，使岭南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地区。两汉时期，也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原人迁徙岭南的行动。一次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大批汉军南迁。一次是西汉末年，中原战火纷飞，为了逃避战乱，一批中原人被迫迁往岭南。一次是东汉末年，北方的农民战争及军阀混战，也使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秦汉统治者在岭南设置郡县，南迁的中原人“与越杂处”，他们都成为封建郡县的“编户齐民”。南越族逐渐融合在汉族里，原来不是汉族的地区，变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一般说来，平原地区或受汉文化影响较高的地区，被融合的程度高些，越人消失的时间也快些；山区、海岛地区则相对慢些。而在汉族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地区，越族则可能继续保存下来，这就是现在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来源。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古代越人不论是演变成为汉族，或者发展成为现在的少数民族，都有一段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秦汉以后的史书，不再言“百越”之事，而出现“山越”一词，唐代以后，正史中不再见山越的记载，大约至唐代，越人名称已基本消失。因此，从民族的发展变化来看，秦汉时期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总之，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许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庆祝广州建城 2210 年的时候，加强对这一地区秦汉时期历史的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广州地区秦汉考古的发现与收获

麦英豪

广州，秦汉时称番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统一岭南后为南海郡的首县（现知南海郡下有番禺、龙川、博罗、四会、揭阳共 5 县）；又是南海郡的治所。秦亡，原秦将赵佗据有岭南地建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共 93 年。广州的名字是在公元 226 年才出现的。大概自秦以来它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海路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市。

一、广州地区秦汉考古的四大发现

现代田野考古在本世纪 30 年代进入广州，当时曾发掘过几座汉晋墓葬。大型古墓的发现还要早些，1916 年在广州东山的龟岗，建民居挖地基时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的木椁墓，因椁板上刻有数码编号而轰动一时。可惜当时还未有考古学方法进行清理发掘，全墓情况及出土器物的资料未完整地记录下来，当时曾误断为南越文王胡冢（即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墓）^[1]。广州地区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现的。从 1953 年初以来，考古发掘连年不断（十年动乱期间或有中断）。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配合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动土施工中，在市区和近郊、远郊发现了多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和大批古墓葬。50 年代广州的考古工作与西

安、洛阳、南京等被列为全国八个“考古发掘的重要据点”之一^[2]。广州的秦汉考古则以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官署遗址、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我们概称为“广州考古的秦汉三宝”）和两汉墓群的发现为重要，分别简述如下：

（一）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位于今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西段，南距珠江前航道的天字码头1300米。1975年试掘400平方米，揭开1、2号两个造船台的一部分和南面紧贴船台的一片木料加工场地。遗址深埋在地表5米以下。1994年进行了第二次局部发掘，在遗址的中心位置打横剖开，把三个造船台都揭出一段，对三个木质的船台结构基本探明。

这处造船工场是赵佗称帝后废弃的，1号船台的枕木经C14测定，距今 2190 ± 90 年。造船工场是建造在河滩沉积的灰黑色黏土层上（含有浮游类海洋生物，初步鉴定为海相沉积层），三个木质的造船台平行排列，船台的结构原理与今天铁路的轨道无异。船台东端有“横阵”结构，表明已到尽头。向西延伸至今马路之下，估计长度超过百米。1号船台在南，南边紧贴着造船木料的加工场地，2号船台居中，3号船台在北边，结构相同，均由枕木、滑板与木墩三个部分组成。两行滑板平行放置在枕木上组成滑道，滑板宽60—70、厚15—17厘米，两行滑板上分置一对对的木墩，墩高0.9米，在木墩上造船。每对木墩的纵向间距不等，可能是与船上的肋骨相应有关。经鉴定，木墩为材质坚重的格木，以利于承托船体；两行滑板因贴着湿泥，选用耐腐蚀的樟木；枕木的作用在于扩大受压面积，因而采用质轻富于弹性的杉木。船台的三个不同部件选取材质性能不同的木材组成，以适应不同功能的要求，表明当时对木材特性的鉴认已有很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1、3号船台滑板上的每对木墩都是平置的，与滑板无固定的结构，个别木墩下还加垫一两块小薄板使木墩平稳。惟独2号船台上的每

个木墩，其平底的中间都有一个小圆凸榫，插入滑板面的小圆卯眼中，木墩的位置得以固定。因为3个造船台的每对木墩横向都成一直线，显然，位居中间的第2号船台就是个定位台了。因为船体建成下水之时，要先将下面支承的木墩卸去，使船体平置在两行滑板上，才可推入水中。若再次造船，1、3号船台每对木墩的纵向间距，可依照2号台来定位。

由此表明，当时这个造船工场是按规格成批建造船只的。1、3号船台两行滑板的中宽为1.8米，2号船台的中宽为2.8米，据此宽距推算，此处工场可建造船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板船。此外，由于船台的两行滑板与下面垫承的枕木之间既不用钉，也无榫卯作固定，所以两行滑板的宽距可随需要移动；而且3个船台是平行排列的，其中的1、2号船台和2、3号船台还可以并台造船。换言之，3个船台用并台的办法可以起到5个船台的功用。因而此处造船工场还可以建造小一些的或更大一点的木船，以适应内河和沿海岸航行的不同需要^[3]。造船遗址的发现，使我们看到秦汉时期的番禺（今广州）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为中国古代造船史和航运史的研究提供了头等重要的新资料。

（二）南越国官署遗址

位于中山四路忠佑大街，西距秦代造船遗址约40米。1995年下半年发现，已揭开遗址的一小部分，面积400平方米，为一个呈斗形的水池状石构建筑。水池的西、南两边池壁都作斜坡形，仅露出长20米，往前延伸多长，未明。因其上有5—8层的楼房压着，无法钻探。南面的斜坡形池壁已露出部分整片是用砂岩石板精心铺砌，由南向北倾斜，坡度约15度，坡面斜长11米；西面的池壁其大小及用石板铺砌的方式与南壁全同，都是选取5—15厘米灰白色的砂岩石板作冰裂纹斗合斜铺，两边池壁斜坡的交角相接处砌出一条直线，砌作精工。此外，南面池壁的铺石板之下

埋有一条木质的渠管，也许是给池中注水用的设施。池壁上端还有三块残石板，但宽度已不可知了。池的底呈水平状，全铺河卵石和碎石。池中的东北角还揭露出一根大型的石柱遗构，是用灰白色砂岩大石板叠砌成，已向西南方向倒塌。据此推测，池中原有大型的构筑物，未被揭开。

压在池壁上的地层中出有大批绳纹的板瓦、筒瓦，还有云纹和“万岁”瓦当、印花铺地砖、八棱石柱、八棱石栏杆、陶质窗棂等陶、石建筑构件，还有铸铁的门枢轴、铁斧、铁凿、错金铁剑和鎏金的半两铜钱等器物。

在南面和西面池壁的铺石板中都发现有石刻文字，有“蕃”、“阅”、“贲”、“皖”等字，同为秦隶，字径约30厘米，在西池壁处还有“□□北诸郎”五字，竖行，刻在多块石板上，说明这些石刻文字是在池壁铺砌之后才刻上的。这是岭南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另外，在出土的板瓦、筒瓦中还有打上“公”、“官”等单个字的戳印；还有一块印花铺地残砖，在一角处打印有“左官帑單”四字。发掘后，已在遗址四周钻探4.6万平方米，初步推测这个池状建筑遗址的面积约有4000平方米，可能是南越国官署内一个与蓄水有关的大型石构遗存^[4]。

考古发掘所见，中国秦汉及其以前的建筑，主要是夯土台基上的木构架结构，此处大型的石构建筑遗存尚属首次发现，遗址规模大，又处闹市中心，十分重要。查考古番禺自秦始皇在岭南置郡县，后来又作南越国都城，遗址所在的地点应为番禺城的中心所在。其后经历二千多年，随着人口的日增，城区亦日渐扩展，物换星移，城市的变化太大了，但此处作为城区的中心迄今无改。由此上溯，历朝的宫宇、衙署、寺院、民居第宅已被层层地叠压在今日的现代都市之下。自宋以来，人们对番禺的得名和任嚣、赵佗时的番禺城坐落位置已作过不少考证工作，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可信的地下物证。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

中有 9 件有“蕃”或“番禺”的铭文，这是历史物证，它为番禺的命名取得了一个合理的解释^[5]。今遗址中发现一个斗大的“蕃”字铭文，这就是番禺的简称，也是二千年前番禺城坐落位置的历史标记。这次发现被评为 1995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6]。

（三）象岗南越王墓

1983 年发现。陵墓构筑在象岗的腹心深处。穴道从岗顶开凿，为深 20 米的竖穴，前端向两边掏洞构筑耳室。再前（南）为斜坡墓道。石构的墓室由 750 多块大石，主要是红色的砂岩石砌筑而成，仿照墓主生前的前堂后寝的格局布置，结构紧密，布局对称。石室南北长 10.85 米，东西最宽 12.5 米，分前后两部分，共七室，由两道石门分隔开。前部三室，后部四室，各室有门道互通。七室的分布为：前部正中的前室，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宴乐厅堂，室中四壁和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装饰华丽。东耳室是宴乐器用的藏所。西耳室用作贮存礼乐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器及珍玩等的库藏。后部居中为主棺室，室中安放墓主的棺槨，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陪葬印玺九枚（墓主身分因有印玺，得到确认）。东侧室殉葬四位夫人（妃妾），各有印玺随葬，身分清楚。西侧室埋有七个殉葬的庖厨隶役，她们都无棺木，室中还置猪牛祭牲。主棺室的北面是贮放御膳珍馐及一百多件炊具与容器的库房。墓门外有一座木构的外藏槨，槨内和前端的斜坡墓道上各有一个殉人，属墓主的守门卫士。

墓中除 15 个殉人外，出土的各种随葬珍品一千多件（套），其中以青铜器和玉器最为精彩。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期间岭南地区的开发，城市的物质文明，南越国的历史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发掘后，已在原地建立博物馆^[7]。

（四）两汉墓群

广州近郊岗峦起伏，这些大小岗峦往往就是秦汉以来的古代

墓葬区。从本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广州清理发掘了大批古墓，其中以两汉墓为多，出土文物也最为丰富。仅据 1953—1960 年的统计，两汉墓的分布有 82 个地点。在今天的市区也有南越国时期的墓发现，若以最新发现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中心点，东西两墓地相距仅 2.25 公里，可见当日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规模不大，据宋人的记述是“周回十里”，较为可信。广州汉墓的年代可划分为五期：即西汉前期，西汉中期，西汉后期；东汉前期，东汉后期。西汉前期相当于南越国阶段，我们依照广州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把西汉前期上限定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发兵统一岭南之年起，下限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灭南越国之年终，上下延续 109 年，我们称之为“南越国时期”。这阶段的墓据“长秋居室”陶文的发现，还可划分为南越国早期和南越国晚期两段〔8〕。

南越国的墓主要分布在东北郊的华侨新村、淘金坑、今动物园的麻鹰岗，北郊的马棚岗，西郊的西村石头岗、王圣堂的柳园岗等处，往往是三五座或三四十座，分布在山岗的岗腰以上，既有大墓，亦有中小官吏的墓和平民的小墓。只有南郊河南至今未见有这时期的墓群发现，或因当时宽阔的珠江河面阻隔有关。南越国早期的墓，在墓形与出土文物方面都可以看到楚文化因素的存在，但有一种木椁墓，椁底铺小石，棺位置下有一个埋大陶瓮的腰坑，随葬的铜、陶器物全为地方的器形，没有汉文化的器物共存，这些墓的墓主也许就是当地越人的部族首领而当了南越国高官的，但在已发现的南越国时期墓群中，还未见有单独的越人墓地。

在中原大地，到东汉时木椁墓已消失了，但在广州地区一直流行到东汉末年。在木椁墓中，椁室作上下二层，上层置棺具，下层放置随葬器物。这种分室分层结构的木椁墓，在南越国时期已有出现，西汉中期盛行，存在三四百年。它无疑是仿照生人居处

的干栏建筑而来，颇具地方特点。东汉初年广州才有砖室墓出现，大型的砖墓多为圆锥形凸顶与券顶相结合，亦有横前堂的横直券顶结合。墓砖上常有刻写或模印的纪年文字，年代明确。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器，形成了独特的地方体系，形式多样的陶屋等模型，又是研究汉代岭南建筑最可贵的资料^[9]。这些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无异于一本实物的史书，它帮助我们得以较为形象地、可信地了解过去，认识此时此地的社会历史发展，这就是出土文物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二、两千年前广州地区的物质文明

先秦时期，岭南大地远比中原为落后，社会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就目前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今两广境内还未发现有秦汉以前的城邑，甚至稍具规模的民居聚落也很少见到。到了秦汉年间，岭南归入秦帝国和汉帝国的版图，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被《史记》和《汉书》称为岭南一都会的番禺（今广州），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海路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过去，人们要想了解二千年前广州这段历史的概貌，有赖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的一篇《南越列传》和班固在《汉书》中对前传作了重要补充的《南粤》传。但《史》《汉》中的两传所记的主要是赵氏南越国的兴亡史事，着重记述它在政治上与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至于当时本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等则很少涉及。近40年来广州两汉墓的大批发现，秦代造船台与南越宫署遗址的发掘，特别是象岗南越王墓的发现，揭开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宝库。如此丰富的各类遗物的出土，重要的遗迹被揭开，为我们研究二千年前广州（番禺）以及岭南大地的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下面仅就农业、主要手工业等方面的考古发现作一概述。

（一）农业

广州是古代土著的南越人聚居的中心。在百越族中，南越人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但在秦统一岭南之前，仍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秦平南越后，50万秦军留戍，他们与本地的越人共同开发岭南。铁农具铁工具以及马牛羊等家畜从中原输来，这对岭南的社会生产是破天荒的大事。岭南的汉墓，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墓有大批铁器发现，绝非偶然，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广州的南越王墓出土铁工具、铁农具和兵器等246件^[10]，与之同时的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铁器25件^[11]，平乐银山岭墓群出土铁器206件^[12]，还有广州汉墓出土的一批铁器。总的来看，数量之多，品类之广确属空前。表明铁器在南越国的农业、手工业等重要生产部门已较为普遍地使用了。但铁农具的种类还不多，只见有浅耕起土的锄、镢，还有镰刀，虽然水牛在西汉遗址中已有发现，但还未能肯定已用于农业耕作，因为先进的铁犁牛耕如铁犁铧、齿耙等深耕农具，还未见于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与遗址中。大概在武帝灭南越以后，牛耕才被较普遍地推广到岭南。

已发现的粮食作物，以稻谷为多见，还有黍、粟、大麻籽和高粱。属蔬果类的，已见有橄榄、梅、李、桃、橘子、酸枣、红枣、人面子、花椒、金银花、西瓜、葫芦和荔枝。到了今天，这些仍为岭南所产蔬果的主要品类。

广州和广西贵县的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较普遍的有屋、仓、囷、井、灶五种陶塑的模型明器随葬。最先出现的是平面横长方形的干栏式陶屋，上层楼居设有厕所，其后的曲尺形、三合式、楼阁式陶屋，还把人居与畜圈合在一起。厕所与圈栏相通连的结构，颇能说明当日已普遍使用厩肥，这对于改土与提高产量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仓与囷同是高脚屋式的干栏结构，贮粮的仓室下面用木柱支承，使地台高离地面，这是符合南方多雨，地势卑湿的自然条件的需求的。陶屋中塑有持杵对臼而舂，扬箕以簸的陶俑，但